

金瓶梅探原

金瓶梅研究之一

魏子雲著

巨流圖書公司印行

生
誠
極
探
原

田
東

•金瓶梅研究之一•

金瓶梅探原

目 次

羅序（羅宗壽）	一
莊序（莊練）	三
端引	七
「金瓶梅詞話」的作者	一
「金瓶梅詞話」的成書年代	一
袁中郎與「金瓶梅」	五
袁小修與「金瓶梅」	七
沈德符與「金瓶梅」	八
袁中郎「觸政」之作	一〇一

論明代的「金瓶梅」史料	一一一
「水滸傳」與「金瓶梅詞話」	一四三
王嬌李——我國文學史上的幸運兒	一五五
論蘭陵笑笑生	一六一
「金瓶梅」的敍跋	一七一
論「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	一八一
補述	一〇九
參考書目	一一三

讀魏子雲先生金瓶梅探原

羅宗濤

初次見到魏子雲先生，大約是十年以前的事。當時我擔任政大文藝社的導師，爲了舉辦文藝座談會，同學們邀請了魏先生參加，記得在座的還有趙滋蕃先生、司馬中原先生、墨人先生、瓊瑤小姐……等作家，我列席旁聽，在衆人廣座中見到了魏先生。在我的印象裏，魏先生說話是挺有條理的，既誠懇、又嚴肅。魏先生的許多文章，我早就拜讀過，在這以後，我讀他的文章就更加認真了。從談話和文章裏，我覺得他是個「讀書求甚解」的人。可是我還是料不到魏先生竟然肯以七年的光陰，鑽到金瓶梅裏去求甚解。

第二度見到魏先生是幾個月前承呂天行先生介紹的。在這幾個月裏，我們通了幾封信，在信札往返中，我非常欽服魏先生謙虛的態度，一些問題，他竟願意聽取我這後進末學的意見；同時，我也知道他治學的態度非常嚴謹，每當我以不求甚解的態度來討論問題時，總是很快就得到他表示不滿意的回信。看來魏先生也是率真而急性的人。一個急性子的人費這麼大的工夫，來從事這樁吃力而不容易討好的工作，真是不可思議。

認識魏先生，除了在治學爲人方面受到啓迪之外，最具體的收穫，就是能有機會先睹爲快讀到魏先生「金瓶梅探原」的二校稿。「金瓶梅」我只草草讀了一遍，雖然也隱隱約約感到有些問題，但並沒有擋在心上。現在拜讀了魏先生的著作，覺得魏先生的許多見解實在精闢，有些是先得我心，有些是我從來就沒想到過的，著實大開了眼界。

魏先生的著作，解決了金瓶梅的一些問題；在某些部分，或許還不能夠得到圓滿的解決，但也提出了了解決的途徑；至少，魏先生也提出若干有價值的問題。負責任的學術研究，所能做到的，就是這些。

魏先生已經在金瓶梅的研究上邁進了一大步，他所提出的問題和解決的方法，必定引起其他學者的注意和興趣，大家如能共同留意新資料的發現，貢獻各人的意見——例如對明代各地的生活習慣、語言實況等提出更確切的描述，當可減少「以今度之」所可能產生的誤差。那麼，金瓶梅的研究，勢必會有更豐碩的成果。現在，像莊練先生不是就躍躍欲試了嗎？魏先生那兩千多個日子所投下的心血是不會白費的。

當這本書還在排印的時候，魏先生又開始金瓶梅「人物論」與「藝術論」的探討，希望不要讓大家盼上七年之久。

敍

金瓶梅在從前被認為是誨淫的穢書。正人君子與道學先生聞其名掩耳疾走，直到現在，方有人以藝術的眼光給予公正的評價。如最近由時報文化公司出版的「金瓶梅的藝術」一書，作者孫述宇先生即曾從主題意識、人物個性、寫作技巧、藝術成就等方面從事深入的觀察研究，認為此書無論是塑造人物或認真探討人生態度，都勝過水滸傳與紅樓夢。水滸與紅樓，早被國人公認為古典文學的不朽著作，其地位極為崇高，如今金瓶梅竟能凌駕而過之，豈不令人十分驚訝？但是，對金瓶梅的藝術評估雖然能提高金瓶梅的文學地位，而因此書在傳抄時期就已被人視為穢書之故，不但作書之人不敢自署真實姓名，即是談到此書之人，亦常閃爍其辭，以免受穢書之累。於是，有關此書的真正作者及寫作動機等等關係重要的資料，都因此而被掩蓋隱沒，現在所能見到的，只是一些荒誕不經的傳說而已。對於希望進一步瞭解此書的人來說，這一重麻煩的障礙就很難突破。

魏子雲先生素來從事小說寫作及文學批評，不知為何，忽然對上面這些問題發生了興趣，窮數年

之力孜孜鑽研，不但跑遍了國內收藏文史書籍最多的幾個大圖書館，更遠從美國、日本等地蒐求資料，潛搜冥索，苦思焦慮，以求打破這層難解的疑團。幾年辛勤努力的結果，他寫下了十多篇研究專文，討論金瓶梅的成書年代、可能作者、以及版本、史料等等有關問題，先後在中華日報副刊、書和人、中外文學、出版與研究等報刊上發表，很受學術界的重視。這些文章，現經輯印成爲專書，就是這本「金瓶梅探原」。魏先生的研究，範圍廣而用力勤。他所開拓的園地，足夠使我們大開眼界，知道前此所傳「此書乃嘉靖間某名士手筆」云云的說法，很可能是某一個人所故意製造的迷陣，其目的在轉移讀者的視聽。而金瓶梅是否果如此人所說，在萬曆三十八、九年間便已有刻本行世，更有極大的問題。凡此種種研究創獲，對於金瓶梅的學術性研究工作，大有啓發作用。藉著魏先生的辛勤努力，許多爲前人所故設的迷陣已被摧破廓清。魏先生的開創之功，貢獻甚大。所遺憾的是，由於文獻缺乏，資料難尋，魏先生的研究計劃屢次觸礁受阻，以致他的研究成績只能限於現在的範圍，說來自然是十分可惜的。

在胡適之先生未曾運用歷史研究的方法從事於紅樓夢的研究考證以前，一般人對於紅樓夢的寫作動機與其故事內容，亦多陷於猜謎式的迷陣，聚訟紛紜而莫衷一是。而自胡先生從考證曹雪芹的生平及其家世入手，對紅樓夢有了新的瞭解之後，大家方始知道，紅樓夢實在是曹雪芹以他自己的親身經歷爲藍本，雜揉其他情節而改寫成的小說創作，根本不是爲影射某些人物或某些政事而寫的政治小

說。關於金瓶梅的研究，將來是否亦能得此圓滿的收穫，目前自然難說。但魏先生既然已在這方面盡了華路藍縷的開創工作，只要繼起有人，已經撒播下的種籽，總會有開花結果的一天。問題是在我們的學術界人士是否也能有魏先生那樣的興趣與精神，繼續在這片園地上耕耘力作。魏先生從事此一研究，由於他只是一手一足之獵，不但力量有限，更難免爲見聞所囿，所以無法廣搜博採，作到盡善盡美的研究探討。如果能有多數同好之人合力從事於此，從他的既有業績上努力開拓新的領域，將來必有更多的創獲。魏先生將他的研究心得發表出來，很有拋磚引玉的苦心，這一點，大家一定不可辜負。

在魏先生苦心鑽研金瓶梅的種種疑難問題時，我很有幸常常聆聽魏先生的高論，不但深知其甘苦，也能在文章未曾發表之前，就已知道其大概內容，極感快慰。見到魏先生的研究成績如此豐碩，我也頗有見獵心喜之情，很想躍馬執戈，追隨在魏先生之後，嘗試一番。只是我自問並無魏先生這種奮力不懈的精神，恐怕始終只能臨淵羨魚，除了眼紅心熱之外，永遠不會有什麼具體成績。希望學術界人士在魏先生的倡導之下，多多致力於此，使得金瓶梅的研究工作，也能像紅樓夢研究工作似的發展成爲一項專門學問，不讓「紅學」專美於前，那就是十分有意義的事了。魏先生的研究目標，暫時已轉移到金瓶梅人物個性與時代背景以及小說藝術等等方面去了，不久之後，諒必有更好的研究成績。我身爲讀者之一，謹拭目以待！

莊練 六十七年雙十節前一日

端引

爲了追尋「金瓶梅」的作者及其成書年代，我耗去了七年有餘的時間，寫出了這十餘篇短文。雖說，我所追尋的問題，今尙未能獲得結論，然就所能閱及的史料來說，我的這份工作，也祇能在此告一段落了。如果以後再有史料發現，當可再予補充修正。現在，這兩大問題，我卻祇能說出這麼一些。

探尋該書的作者及其成書年代等兩大問題，應以袁中郎兄弟的話爲根，一是中郎於萬曆二十四年秋冬之間，寫給董其昌的那封論及「金瓶梅」的信，一是小修於萬曆四十二年八月寫在日記（「遊居柿錄」）中的那段論述「金瓶梅」的話。如果，這弟兄二人的這兩則史料，確是這二人所寫，則可確證「金瓶梅」的前半，在萬曆二十四年間，即已流傳於世。但幾經查證，中郎寫給董其昌的那封論及「金瓶梅」的信，最早刻於吳人袁無涯袁氏書種堂本之「袁石公集」；在「錦帆集」的尺牘中。該書註明刻於萬曆己酉（卅七）秋。但從中郎兄弟的詩文中，則徵之中郎生前並未見到袁氏書種堂刻的「

袁石公集」。按袁中郎即世於萬曆三十八年九月，而袁小修於萬曆四十二年秋日記中所記袁無涯抵
楚，曾論及袁氏書種堂所刻之中郎詩文有誤，足徵袁氏書種堂刻的「袁石公集」，袁小修在萬曆四十
二年秋方行見到。而且，袁小修在寫給袁無涯的信中說：「中間與人書牘，信筆寫去，一時不存稿者
有之；」即已說明中郎書牘之無從以底稿印證真偽矣！因此，我一直希望能尋到一部在中郎死後，由
袁小修審訂作序的家刻「袁中郎全集」，對於中郎所寫之詩文與書牘，凡有所懷疑，即不會集以付
梓。倘使中郎寫給董其昌的那封說到「金瓶梅」的信，仍在集中，即可確證「金瓶梅」一書在萬曆二
十四年之間，便在世上流行。同時，也足以證明袁小修寫在日記中的那段論述「金瓶梅」的話，在時
間上，也吻合上了。

袁小修寫在日記中的那段論述「金瓶梅」的話，附在論「水滸」之後，在語意的連貫上，頗有可
疑。所以我在論「袁小修與金瓶梅」一文中，推想這一段話，可能後人纂附。此後又在「論明代的金
瓶梅史料」一文中，認為小修頗反對有名教之思者的對「金瓶梅」之「崇」，他認為「此書誨淫」，「
不必崇」。然而其兄中郎，則認為此書是「雲霞滿紙，勝枚生七發多矣！」更認為此書應與「水滸」
相配，作為酒上甲令，不知此者便是「保面甕腸非飲徒也」。可以說對於「金瓶梅」的看法，是兄美
而弟刺。可是中郎小修這兩弟兄平時在文學上的見解，一向是沆瀣一氣，怎會有如此大的意見出入？
凡略知袁氏兄弟者，怎能不作如此疑想。但願小修的這則日記是後人偽託，要不然，則足以引來證明

沈德符寫在「萬曆野獲編」中的那段論述「金瓶梅」的話，全是瞎說。

關於「金瓶梅」的作者，歷來悉作王世貞之說。此說的來源，便是基於「萬曆野獲編」中的那段話。「萬曆野獲編」雖出版甚遲，但在皋鶴堂謝頤於清康熙三十九年爲張竹坡的評點「第一奇書」（金瓶梅）作序時，則桐鄉錢枋已於康熙三十年，把「萬曆野獲編」的殘稿，予以重行纂訂成帙，雖未板行，已在傳抄。自可想而知謝頤的序言，說「金瓶梅」是王鳳洲作無疑，當係根據沈德符的話。可以說，凡是持王世貞乃「金瓶梅」作者之說的人，所據根源便是沈德符的那句「聞此爲嘉靖間大名士手筆」的讖言。此一問題，直到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吳晗發表了他那篇「論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一文，方把此說予以澈底否定。「金瓶梅」的作者，非王世貞之說，是業已確定了。那麼，「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誰呢？

「金瓶梅」的作者是誰？迄今雖無結論，但數十年來，凡是論及該書作者的人，則一致公論這位作者必定是山東人。此一說法所依據的理由有二：一，欣欣子的序文寫明作者是「蘭陵笑笑生」，蘭陵故城在山東嶧縣境內；二，書中的語言，是山東土白。關於這點，我則極力反對。我反對此一說法所依據的證據有四：一，蘭陵地名不止山東嶧縣有，江南的江蘇武進也有；（日本大漢和辭典說安徽也有蘭陵地名，未考。）二，所謂的書中「山東土白」，並不止是山東一地的語言，整個中原上黨各地，都流行那類方言；三，書中所寫的飲食習尚屬於江南；四，書中所寫的生活起居，亦率屬江南；

所以我據以推想「金瓶梅」的作者，必定是一位江南人。更由於書中的語言，不時夾雜著吳語、燕語，推想此人可能是一位宦居京師遨遊南北，老於人情風物習尚的江南人所能寫出。目前的證據，只能把範圍縮小到如此。至於作者是誰？自還有待更進一步去求證。

我想，凡是能認真讀了我這本小書中的斤斤十餘篇短論的人，準會感於我在懷疑著沈德符這個人，可能就是「金瓶梅」的作者。不錯，七年餘的研究，始終不能洗去此一疑設的意想。當然，要是袁中郎寫給董其昌的那封信，確是中郎手筆，則沈德符在萬曆二十四年，年紀只有十八歲，自不可能寫出像今之「金瓶梅」這樣一本書。要是袁中郎的這封信，可以證明是袁氏書種堂所纂附呢？那我所疑設的對象，可探討的問題，就更其有力了。

沈德符是浙江嘉興人，出生於京師，二十八歲時捐入太學，到了四十一歲才中舉。上三代都是進士，有兩代在山東作過四品五品大的官。此人一向惡名昭彰，三十五歲時曾中舉，主考官卻因為怕列榜後遭受物議，又把他剔除了。像這些情形，固不足引以為證物，卻未嘗不是據以推敲的理由。尤其「萬曆野獲編」中的那段話，不落實之處，比比皆是。我已考出袁中郎的「觴政」一文，作於萬曆三十五年間，沈德符如何能在先一年即知中郎有「觴政」一文？若袁小修的日記，所記述的「金瓶梅」事是實，則小修在萬曆四十二年尚未見及該書的全帙，則沈德符又如何能在萬曆三十七年間，向小修抄得「金瓶梅」的全帙？何況袁小修在日記中已說明，他於三十七年冬抵京，三十八年春落第後即行

南返，在京爲時甚短。沈德符與袁氏兄弟又非知交，（袁氏兄弟詩文中，無一字論及沈，）自不會將才得到的「金瓶梅」全帙，借與沈帶回去抄錄。想來，沈德符說他在萬曆三十七年間，向袁小修借抄了「金瓶梅」全部挈歸，是毫無根據的了。再加上他引述馬仲良的「時榷吳關」之「時」，是萬曆四十一年，與其所謂「借抄挈歸」的時間，也無法絲絲印證。復有「未幾時而懸之國門矣」的問題，也很難對證。還有「玉嬌李」的問題，也說無實據。於是越加推敲，越發徵諸沈德符的這一段論述「金瓶梅」的話，幾無一句可作佐證。那麼，沈德符又爲何要編造這麼一大段不實的話呢？像他寫在「萬曆野獲編」的一些記述，有的只是耳食手錄，誤在傳聞故實，則尚有可說。但這段論述「金瓶梅」的話，全是他自己的經歷，如有不實，自是故意編造的了。這一「編造」的問題，就是值得我們去設疑沈德符與萬曆丁巳本的「金瓶梅詞話」，有著蛛絲馬跡的理由。

多年以來，論述「金瓶梅」者，幾無一不引證「萬曆野獲編」的這段話，作爲圭臬性的憑依。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韓南博士論文「金瓶梅研究」，其中論及版本等，幾乎全部的論點，都以沈德符的話爲準則，可以說是爲沈德符的這段話去尋求註腳。這一點，與我的「探原」的觀點，是恰恰相反的。雖說，我這十餘篇短論的探討，由於求書之不易，引據尚未臻於充實，而我卻自信這十多篇短論，最少已經否定了以下數事：（一）作者不能肯定是山東人，可以肯定他必是一位具有江南生活習尚的人。（二）沈德符寫在「萬曆野獲編」中的那段論述「金瓶梅」的話，幾乎全不可信。（三）袁中郎兄弟二人論述「

「金瓶梅」的話，真偽尚待求證。四「金瓶梅」的成書年代，必在萬曆三十年以後。(五)關於作者及成書年代問題，已繼吳晗與郭源新又向前開拓了一大段路。這些問題，都有待未來的工作，繼續去尋求證據，一一加以清理、證明、審疑。縱然在我有生之年，未能完成，總給後人開拓了一條新方向吧！過去，從來沒有人朝這一個方向走過。

我一直想尋得袁小修審訂並作序付梓的那本家刻本「袁中郎全集」，卻至今連目錄也未能尋到。不知世間還有沒有這部書？再據明刻譚友夏集，知中郎嗣子袁述之，還刻有一部「袁中郎續集」，由譚元春作序，這本序集也迄今未能尋到。只在美國普林斯敦大學東方圖書館，印來明刻「三袁先生集」，證明了陸之選刻的四十卷「袁中郎全集」增訂本，其中所增之詩文，大多從此一「三袁先生集」中所移去。此一「三袁先生集」，不知刻於明朝何代？可能在萬曆天啓之間。如其中那封向謝在杭索還「金瓶梅」的信，經我考證，便大有問題。（見論明代的「金瓶梅」史料一文）。譬如沈德符著「清權堂集」所涉及的交遊人物，均尚有待去尋求他們的詩文集來，加以印證沈德符與他們的情誼，以徵沈氏之爲人。這些人的著作，都很不易尋得。我只見得盧德水的一部「尊水園集選」，還是全集，其中只有一處提到沈德符，約約數言，與沈氏寫在「清權堂集」中的情誼，相距頗遠。他如馬仲良之駿的「妙遠堂集」，也迄今未能尋得。由盧世淮及袁氏兄弟觀之，堪知沈氏詩文中所寫入之交遊，則大半是自炫己之盛誼，一頭之熱，頗非兩相歡愜之情。盧世淮少沈德符十餘歲，沈寄給盧的

詩作，盧說是輒隨手丟棄。亦足證沈德符生前在時人中的身價矣。

近人雖還有人設想在萬曆丁巳本的「金瓶梅詞話」之前，或許還先有一個刻本問世。（鄭振鐸則直說金瓶梅板行於萬曆三十八年。）然而，若依據馬仲良之司榷吳關，乃時在萬曆四十一年，則以堪證「金瓶梅」在萬曆四十一年以前，絕無刻本問世。那麼，李日華的日記，已可證明他在萬曆四十三年正月間，見到的沈德符家藏「金瓶梅」，還是抄本。這幾相對證，都可印證到這部萬曆丁巳本「金瓶梅詞話」，大概就是「金瓶梅」的初刻本。依據沈德符那句「未幾時而吳中懸之國門矣」的說法，判定「金瓶梅」初板於萬曆三十八年的設定，可說已無所附麗矣。

對於「金瓶梅」的成書年代，我從寫在書中的干支生屬問題，一一交錯清查，得出的繫年，可以編到萬曆四十五年左右。最明哲的編年，到萬曆四十年左右。從情節發展上看，八十回以後，多是一些人事的交代。雖說八十回以後，是以春梅為主，而實際上，也只是以春梅作為交代其他各人結果的樞紐而已。所以「金瓶梅」八十回以後的情節，一幌眼就寫到孝哥十五歲了。因而在干支生屬上，在八十回以後，便不易再予明確繫出。但如從人的情性慣例來說，如果「金瓶梅」的作者，運用的干支生屬，確是現實的時代，自然是回顧多於前瞻。若作如此推想，則可證明這位作者寫到九十回以後，時間可能已過了萬曆四十年以後了。在八十八回寫有「且喜朝廷冊立東宮」一句，恰與萬曆二十九年冊立常洛事的民心相同。這顯然寫的是冊立常洛為太子時的人心歡愉之情。足可證明作者寫此八十八回